

北平人的 战争

周良国 / 著

文匯出版社

一个人的北大荒

周良国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北大荒 / 周良国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496-0347-3

I. ①一… II. ①周…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7230 号

一个人的北大荒

作 者 / 周良国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张 晋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20 千

印 张 / 9

书 号 / ISBN 978-7-5496-0347-3

定 价 / 19.00 元

目录

Contents

告别军营	1
初到哈尔滨	11
见闻“二次反右”	19
夜宿“难友”处	26
和家属一起劳动	37
冬季短训班	48
二进医院	60
我当畜牧兽医练习生	67
开始创作文学作品	74
山东支边青年来了	81
文艺宣传小分队	90
《乌苏里江报》记者生涯	97
喜遇学生	106
冻江捕鱼	112
北国原住民	119

《在南泥湾的道路上》的编写回忆	126
难忘虎林大食堂	136
周末舞会	143
一次始料未及的文艺座谈会	151
一段有待发掘的史实	156
创办人——《北大荒文艺》人物印象之一	162
负责人——《北大荒文艺》人物印象之二	171
编辑室的“老右”——《北大荒文艺》人物印象之三	181
上海同乡——《北大荒文艺》人物印象之四	191
也是老乡——《北大荒文艺》人物印象之五	199
“乌鲁木齐”及其他人——《北大荒文艺》人物印象之六	208
文化圈的小字辈	213
三过虎头	223
列车连结两地情	231
两局合并前后事	239
仍在荒原上	247
漫漫甄别路	257
怎一纸公文了得	263
回到江阴以后	268
后记	275

告别军营

1958年4月，我告别了奋斗七年的军营。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像我们这样建国前后入伍的小知识分子，早晚都要离开军营的。朝鲜停战后，先是大批女同志转业到了地方，以后陆陆续续又有许多人升学的升学，退伍的退伍。就我来说，组织上在1956年就动员我去考大学。因要负担家庭，承担正在上浙江医大的哥哥的学习费用，我推迟一年，于1957年报考了大学，被录取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代革命史专业（后改为党史专业）。当时安徽全省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有700多人，录取21名，录取比例是35：1，我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光荣的离别军营。

然而，光荣却变成了耻辱。我正欲去大学报到时，正遇上“反右”开始，被迫留下参加运动，而且作为批判对象。批判的内容包括我报考大学，是属于右派分子所推行的“合则留，不合则走”的信条。我欲哭无泪，只好像砧上的牲畜，任凭宰割。

经过半年多的反右“洗礼”，戴上“中右”的帽子，被发配至东北边疆劳动。尽管我所在的安徽军区干部子弟学校校长折聚英（此人是孔厥笔下《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找我谈话时说：“这是光荣的使命，将来仍能成为一名好干部。”尽管我也经过“报名”、“批

准”等顺序,但我知道这是一种“清洗”,是一种“流放”,是一种耻辱。结果没去成北京,却去了北大荒。

我离开军营的情景,可用“凄凉”两字来形容。当时军区干部部批准我回家探亲一周,所以我先于他人离开军区大院。没有欢送,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身一人乘三轮车来到合肥火车站,真可谓是孤孤单单,冷冷清清。

回忆起 1951 年 7 月参军时的热闹情景真是天壤之别。我是 1951 年 7 月 15 日参军入伍的。那时朝鲜战场正烟火纷飞,炮声隆隆。党中央、国务院号召知识青年参加抗美援朝,学校里不断播放“年轻的心在跳跃,我们的热血在燃烧,让我们走,走向军干校,让我们走,走向最前方……”的歌声。我所在的学校 1 600 多名学生几乎都报了名,但领到报名单的不足 100 人,我是其中之一。

报名虽都是自愿的,但动机却各不相同。多数是受形势所使然,被政治热情所鼓动;也有不想上学,要另找出路的;当然,更有怀着“保家卫国”、“抗敌守土”理想的。就我来说,上述情况兼而有之,我出身于工人家庭,父亲是邮差(投递员),母亲一度做过摊贩,家境贫苦,特别是日军统治时期,仅靠父亲每月三斗米的微薄工资生活,受尽了苦难和凌辱。解放后战争又起,当然不愿再遭二次苦,再受二遍难,因此想报效国家,拯救家庭,牺牲小我,保全大我。同时,因为家庭人口多,解放后,生活仍然窘困,特别是每学期都要申请减免学杂费,处境十分尴尬,因此也想另谋生路,至少能减轻家中的一份负担。我报名参军的行动,得到班主任和校方的完全认可和全力支持,得以领取报名表。

领报名表的情景是十分激动人心的。当时我就读于邑庙区最大的中学糖业中学(现为文建中学)。那天学校大礼堂的台上,堆满了鲜花,台前是学校新组建的铜管乐队(这在全上海市也是罕见的),台

下全校学生、教职员工，部分家长坐的坐，站的站，把整个会堂都挤爆了。学校最年轻的英语教师谭老师带着一批高三班的女学生充当了“礼仪小组”。我们鱼贯上台，在谭老师手中接过报名单，又“检阅”了穿着花裙子的“礼仪小姐”，心中那份自豪和激动真是难以形容。最后批准参军的只有 20 多人。我们班级 54 人都报名的，领取报名表和有 10 多人，批准的只有 3 人，其中包括我。

其实，我是不符合参军条件的。当时年龄不满 16 岁，体检时体重是 35.1 千克，身高是 151 厘米，综合体质评定是丁等，完全是个小屁孩子，哪能“走到最前方”去。可是我家庭出身好，父亲周柠是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攻打北洋军阀闸北警察署的老邮电工人，母亲陆和珍是三代贫农。无一有钱的亲戚，更无海外关系。本人又清白无瑕，再加上这次招军的重点是像我这样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我就被破格录取了。

关于父亲参加起义的经历，是事后才明确的。原先他以为只是参加了一次人数众多的大罢工，也知道他与朱学范和陆京士是上海邮局快信间的同事。后来，才得知朱学范靠向中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政部长，陆京士则投向国民党成为台湾当局的高官。参加起义者多数是像他一样随大流，跟人走，平平淡淡，默默无闻。我参军后，在部队立功受奖，父亲也以工作勤奋，当上了模范军属，在参加全市军属代表大会时，去工人文化宫参观“上海工人革命史展”。他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的是北洋军阀闸北警察署被起义工人攻占后胜利者的合影，其中有着父亲的身影。照片背景是烟火燃烧的警察署，合影者都眯着眼睛，加上事隔多年，已无法辨认。但父亲制服上佩戴的“54”工号赫然在目，这才使他记起往事。但他生性淡泊，并无感觉殊荣，也不要求保存这张照片，要不是我二妹周丽珍陪同参观，我们还不知道这回事哩。直到 1989 年父亲去世后，我撰写的挽联中有



作者 1951 年
参军时的报名照

“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培育六个儿女成才”等句。所以我想我当年的参军也是继承了父亲的志向。也是我被破格录取的重要因素。

一个接一个的欢送会，到处都是掌声、鲜花、鞭炮。那天到南洋模范中学集中时，虽然还没穿上军装，却被仅比我低一二个年级，身材比我高大的男女同学昵称为“解放军叔叔”，真觉得自己已是个“英武”的战士了。

我们这些战士并没有直接到朝鲜前线参战，而是被送到了各类军事干部学校学习。我被分配在上海军医大学（即现在的二军医大），学的是战伤外科和抢救。

经过短暂的政治学习，就转入到业务学习。学医首先要学解剖，我所学的是《大体解剖学》，要从骨骼开始。我们就去挖骨头，身强力壮的同学担任挖掘，我因体力不加，被分配为清洗骨头。上海医大原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医院。我们所挖的就是日军遗骸。他们成堆地埋在棉花地里。我在水池清洗中发现，尸体最难腐烂的是脑髓和牙齿，一天清洗下来，被我摇下的脑浆淹没了小腿，收拾的金牙，竟有 92 枚之多。这成了我们学医的第一课，侵略者尸体成了我们爱国主义的教材。可学医不到一年，朝鲜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局势比较平缓，毛主席又在军内发出“向文化大进军”的号令，我们有两个中队，原建制转行去各单位当文化教员。我所在的二立中队也在其中。

学校政治部黄主任在动员时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毛主席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我的思维跟着黄主任的讲话迅速旋转。不是吗？我们参军时，并不知要去哪里，去干什么。眼看在南洋模范

中学集中点里，一卡车一卡车的同伴被载走了，有的去山东，有的去河北，有的去西南，正是党指向哪，我们就走向哪。黄主任继续讲道：“当初，你们学医，是革命的需要，现在去当文化教员，也是革命的需要，为了整个战略的需要，有许多部队都整建制地牺牲了。”我的思维继续转动，当年报考医务的同校学生有四人，学校指定同届同学徐余章为组长，他父亲是苦大仇深的十六铺码头搬运工人，本人又是青年团员。显然可到部队里担当骨干，可当带新兵的老同志来组班时，他却外出小便了。带队干部就将我们的副组长顶上。到部队后，副组长就当上了班长，由人数较多的渭育中学的组长担任副班长。徐余章却没能当上骨干。后来班长调去了另一个中队，继续留校学习，而我们中队却要整建制改行了，徐余章的一次小便完全影响到后来的发展走向和命运前途。再联系自己，如果在1956年报考大学，将会改写个人的历史，所谓“历史的必然”是由日常许多“偶然”事件累积而成的。黄主任最后说：“你们整建制的改行，想不想得通？如果想不通，我这个师级政治部主任不当了，和你们一起去当文化教员！”

“想得通！”两个中队120多条嗓子一齐喊。

于是，整装出发。出发场面颇为壮观，学校开了欢送会，全队在校门合影，然后分乘几辆军用卡车驶往北火车站，乘车到南京集训。带队护送的是我们大队的教导员。是个在战场上丢了一条胳膊的新四军干部。他坐在驾驶楼里调度一切，而大队警卫员则高踞驾驶楼顶，手握冲锋枪像是奔赴前线一样，我们都热血沸腾端立于车厢内，奔赴新的战场。经过简短的培训，我被分配到了华东军区第一陆军医院（现105医院）当文化教员。把教室当战场。一年后，多数战友纷纷转业改行了，从华东军区卫生部抽调来当文化教员的医生、药剂师、会计、干事等也先后归队了。我们这些无队可归的又属教学骨干的人被充实到安徽军区干部子弟学校，又一次转移了战场。

部队像母亲一样，把我从少年培育成了青年，从学生训练成了革命军人。领导和战友们也无时不在关怀我、培植我。自己也比较争气，在一年中连立两次三等功，并入了团提了干。当我小小年纪就穿着四个兜的军衣、披着军雨衣、蹬着高筒皮鞋等干部着装行走在街上，或是坐在车上，许多老百姓都侧目而视，露出惊羡的目光。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与一位老者（其实也只有40岁上下年纪）同坐对座。我发现这位老农民对我十分关注。从交谈中得知他生长于大别山区，家中的父母、妻子、儿女在日寇扫荡时都被杀害了。他说：“我儿子活着的话，也有你这么大了，能像你这样当个解放军干部，该有多好啊！”以后我曾收到他一封附有照片的信，得知这位“老农民”叫许可兴，时任濉溪县县长。我还记得1955年，我作为军内优秀团员代表参加了在合肥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大会。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大会上讲话：我，40岁，团中央书记，五级干部，你们一定很羡慕吧？不，我羡慕你们，因为你们年轻。毛主席说了，世界是属于你们的！当时我真有一种“拥有世界”的感觉。想不到我这个军队母亲的“宠儿”，经过“反右”斗争，一下子变成了“弃儿”。这就是我离开军区大院时的真情实感。

在售票处买了票，要去行李房托运行李。行李是一只箱子，一个铺盖。虽然简单，但我却不能同时拿起，一个个拿去寄运，又怕丢失。没有任何人来帮我，我只得一个个挪动，即先把箱子挪前十来步，眼睛则盯着铺盖，然后再返回，搬运铺盖，周而复始，花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达行李房。

先到滁县干训队集中报到。我是最先到达的，同日来报到的还有三名某县兵役局（武装部）的征兵干部。其中一名姓孙，在部队是战斗英雄。回家探亲归队后，说起了农村统购统销的凄凉情景，虽然是真实的，却在反右时受到批判，他还“死不认罪”说：“老百姓确实很

苦。”于是被发落到北大荒劳动锻炼。另一个叫陈耀祥，是新四军的骑兵战士，是个打仗勇敢、满嘴牢骚的“老兵篓子”。还有一个（姓名忘了）军官是为了和妻、子团聚报名去垦区的。这正符合兵役局干部转业三种类型，因为“思想右倾”“经常犯上”和“家庭观念严重”的军官，因其不驯服难以领导，部队是不欢迎的，趁“下放”之机，让他们去边疆劳动锻炼。队里把我们编在一班，到吃饭时，连一桌都没坐满，吃完饭我就返沪探亲了。

母亲见到我，真是喜忧交加。喜的是，多半年未通音讯，总算见到我无病无伤地回家了。忧的是要去苦寒的边疆劳动，前途难卜。为了应对荒原的寒冷，母亲要给我增添一条10斤重的棉被。在布店选购被面时，我推掉了营业员挑选的花花绿绿的面料，却选中一款暗黑的被面，这很能表达我当时阴冷的心情，母亲见状难过地流下了泪。对比我参军时，母亲也没有这种生离死别的难过。记得当初，母亲只是包了一包泥土，放在我的行李中，怕我在外“水土不服”，也有“故土难离”的意思。当时我的热情高涨，和现时的“心灰意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母亲是体会到了的。

在家中，父母同我一起交谈。他们叫着我的小名，说：“去北大荒不是自愿的吗？我们就不去了吧！”

我冷静地分析给父母听：如果不去，将被处理回家，照我这种情况，将会成为“无业游民”，愧对乡邻不算，而且无生计。家中条件不好，哥哥还没大学毕业，两个妹妹分别上高中、小学，还有两个妹妹尚幼小。我虽去垦荒，但工资仍按月发放，干部级别仍予保留，对家中可以补贴，将来或许还有发展的机会。况且我久历军营，过惯了集体生活，边疆垦荒正是一种集体生活。再说，去的并非我一人，听说连家属有十万余人。我说：“别人能吃苦，我怎么就吃不起苦呢？”

我把在部队储蓄起来的钱都买公债券交给了母亲，把手表和衣

服留给了哥哥，把积攒的铝质分币分给两个大妹，亲了亲两个小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黄浦江，颇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壮情怀。

回到滁县，人员都已到齐了。我是第一个报到，却是最后一个归队的人。集训队指导员原以为我开了小差，不再归队，见到了我，心中很是高兴，但还是狠狠地批评了一通（此人因文化低，常把“狠”读成“狼”，有一次作报告时，说到苦干和实干加……时，突然记不起下文了，就抬头观看对面墙上的标语，见到巧干两字，就脱口而出，‘我们到了北大荒后要苦干实干加二十三干，因为巧字很像阿拉伯数字23。为此，大家称他为白字指导员。他的指责对于作为“反右”时经过大批判众矢之的的我来说，已经麻木不仁了。不过我原先编入的一班已经满员，就编入了最后报到的六班。因为要等候专列，所以又耽搁了几天，人们就在街上买些路上的吃食和浏览街市。

滁县是滁县专区的治所，是津浦铁路北行的第一个大站。街镇古朴，也很萧条，仿佛与我当初做文化教员时，医院驻在的当涂县差不多。我怕累赘，只添置了一只竹壳热水瓶、一斤香肠和一罐蚕豆瓣酱，倒是不惜步行了十多里路去游览了琅琊山。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优美，望之蔚然而生秀者，琅琊也……”这是宋代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开篇名句，是读中学时所熟记的。既到滁县，不能不去琅琊山一游。

一进山区，只见满目青翠，一派鸟语花香，蓝天白云，林木满谷，山溪潺潺，小泉叮咚，“峰回路转”，曲径通幽，风景果然这边独好。最后在醉翁亭上小坐片刻，不由浮想连翩。

欧阳修因为政治改革失败，被朝廷谪贬到滁州当太守，在风景优美的琅琊山修了座醉翁亭，饮酒作诗，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他在文中写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看似潇洒，但是

胸中积郁很深，忧国忧民之心随时可显。再联想自己，虽然区区一小子，无法跟大文豪相比，但处境也略有相似之处，心境更是相通的。所以说，与其说我是浏览名山，不如说我是在凭吊古人。

专列终于启动北行了，跨黄河、越山海关，来到了被誉为“东方莫斯科”的美丽城市哈尔滨，在这里度过“五一”劳动节，然后登船沿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航行，到达 859 农场所在地东安镇，又经一天的步行跋涉，到达我们的“新家”畜牧分场七队。

这是个什么样的“家”呀！这是一个低洼的“平原”，除了老职工稀稀拉拉的马架子外，就是临时搭建的两座大马架，一座安置全队人员住宿，一座是食堂和仓库。这是名符其实的架子，除了屋顶就是四周立着的木桩子，既不挡风，也不遮雨。那时正是北大荒化冻的时期，地下的积水有齐膝深，几乎要漫过让大家睡觉的统铺。第一顿饭，当然是粗粮，这是名符其实的粗粮，连皮都没有脱去，而且有许多



10 万转业官兵徒步向荒原进军

沙子和杂质，比我在日伪时期吃的六谷粉还要难以下咽，我不知道监狱里的饭食是什么样子。生活条件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艰苦，简直是想都不敢想了。

午饭后一声号令，全队在大食堂集合，分场赵书记（我们习惯地称他为教导员）到场讲话。大家站在水里，他也站在水里。他说：你们今天是转移战场的第一天，生活是艰难些，但我们是什么人？是勇于战斗的军人，你们要以军人的战斗力，向天斗、向地斗、向各种困难斗。今天我们都站在水里，三个月后，如果你们还像这样站在水里，那将是你们的失败，也是我的耻辱。同志们，打足精神，来迎接新的战斗！

听了这番言辞，我不由问自己：“不是告别军营了吗？”接着我又回答自己，“没有告别军营，只是转移了一个战场！”当然这个战场更加艰难困苦，决不亚于烽火连天的战争环境。

初到哈尔滨

我们安徽军区的转业军官从滁县乘专列出发，跨黄河、过山海关，一路来到哈尔滨，住进了黑龙江省军区招待所，等候开往 859 农场所在地饶河县东安镇的轮船。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东北，对哈尔滨这座美丽的城市留下美好印象。

我生长在上海，虽然在学校学过地理，知道中国幅员辽阔，形似一张海棠叶子，故而要遭到日寇蚕食。但从感性而言，对外地的状况一无所知。总认为各地与上海大同小异。及至参军，二军医大仍在上海，不过是在五角场附近，那时候属郊区，出了校门就是大片的农田。我想象中的外地农村，应该也是这个模样。学医一年，改行当文化教员。先去南京集训，总算可以见识沪外世界了。

列车到达南京，我们下车列队，望着眼前的挹江门，虽然高大雄伟，是我在沪时见所未见的。但乘上卡车行进在南京市时，却大失所望。我原以为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其繁荣程度应不亚于上海，至少不比五角场郊区差。可沿途见到的景象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房屋低矮，市面萧条，行人衣着简陋，只有道路比上海宽广，则更显得冷落。但军人很多，几乎每条街巷都被军衣军裤染成了黄色，呈现出一派战时的景象。最后我们到达了南京的热闹地区杨公井，住进了

华东军区卫生部管辖的一片民房，更像是到了贫民窟。白天烈日暴晒，晚上蚊蝇肆虐，我同班同学罗德宝因被蚊虫叮咬，脸上起了脓包，后来发展为败血症，不治身亡。虽被称作烈士，但我们都很感慨：烈士应死在战场上，像他这样死于小小的蚊虫之口，太不值得了！

学习非常紧张，但各单位催要文化教员更为迫切。于是我们一批成绩优良的学员提前结业了，我和其他5名同学被分配至第一陆军医院（当时还叫第一后方医院），地址是安徽。

我自小居住在上海老城厢蓬莱路附近一条名叫“三孟里”的窄小弄堂里，隔壁是烛业公会，管理人员是一个安徽老人。曾听他说起过安徽的情况。留给我的印象，安徽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谁知我们从下关乘车，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目的地。似乎比近临南京的无锡、苏州还要近。这个地方就是安徽省当涂县。

当涂县位于南京与芜湖皖南铁路线的中间，沿江靠路，是军事重地。当时，马鞍山还是其管辖之地，现在已变为受马鞍山市管辖了。境内的采石矶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升天之处。我能在此吸取些古代大文豪的灵气，也颇感自幸。



作者在部队任文化教员时的照片

医院分散设在城区的民房内，条件比南京更差之甚远。吃的是井水，照明用的是蜡烛。但物价很低廉，鸡蛋一角钱可买四枚。当地特产羊肉饺子也只要一角五分钱一碗。尽管我当时每月能领取3元7角的津贴费，也舍不得常去吃这些零食，因为部队伙食已很能满足了。我们虽是供给制，生活较之当地百姓还要好得多。伙房吃红烧鱼时，每班都能分到一大脸盆，如吃西瓜，每个人可分3斤。我们就领回来与附近居民一起食用。